



埃博拉检疫隔离。

摸或追问生命的意义，从而让生命变得真实。瘟疫消解了特殊性，没有人在瘟疫面前特殊，瘟疫以它的抽象性造就了人的抽象性。我们在瘟疫中被流放到了自己家中，这才感觉到真正能够安顿自己的根本不是我们苦心营造的那四堵墙壁围困的空间。此时的瘟疫成了一段破折号，在分开我们的同时又连接了我们。此时的每个武汉人都是中国人，隔离，并没有把他们扔回自己，反而把整个民族的存在容纳于自己无限的主观性之中，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来体验。此时的中国人都是武汉人，那么多的外地医护工作者和军人选择来到武汉，而且他们明白这一选择意味着什么。对于曾经按部就班的生活来说，突然闯入的瘟疫仿佛是一个错误，人们需要等到这个错误被修正之后再重新接续原来的生活。但是，经历瘟疫洗礼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回到原来的生活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

三、瘟疫制造了历史上的非常政治时刻，迫使1346年以后受到黑死病致命蹂躏的欧洲各城市以面对危机启动行政能力为手段，实现非常政治下的制度创新，结果不但造就了欧洲城市的黄金时代（1350-1550年间），而且间接推动了城市治理体制在区域规模上的复制，即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现代国家的自我想象中几乎都有一个抗击瘟疫的城市的原型。今天的武汉也不得不暂时性地成为一个乌托邦，不得不接受全面安排市民生活的完整方案，同时组织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这一政治构建对于当下正在推行的城市“社区建设”到底意味着什么，

或许还需要后瘟疫时代的持续观察。2003年非典过后，人们才慢慢发现，此前基于经济转型、住房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化而造成的基层治理难题以及制度短板，有很多都在“抗非”运动中解决了，或者补齐了。

四、医学在此次武汉疫情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程度上的无能为力，可能表明科学与疾病之间的博弈关系已经发展到另一个拐点上，即科学在治疗疾病的同时，还参与了病毒变异的过程，最终帮助变异出了自己很难治疗的新型病毒，使科学与病毒的战争变成了科学自身的左右手互搏：科学治疗疾病的能力有多强，被科学参与制造出来的病毒就有多难治疗。这个担忧是麦克尼

尔在文末展望疫病史未来时提出来的，依据是范畴更大的科学与人类的悖论，也就是科学减少了死于瘟疫的人数，但它增加了炮火的杀伤力。现代科学对生命的毁灭远远超过对生命的救治，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对科学崇拜予以警觉。科学崇拜的问题当然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把科学当作一种偶像。科学崇拜不承认科学的边界，认为科学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得到无限的发展，因此，如果它已具备克隆人的技术，它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实现，完全不顾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伦理后果。科学与病毒变异的关系显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在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科学的医学及其制度实施才能走出困境的当下，对科学崇拜的质疑显得那么地不合时宜。但我必须说，麦克尼尔的忧虑现在读起来令人寒意顿生。

五、瘟疫天生携带着阴谋论的胎记。它出现了，但人们看不到；或者人们只看到了它的后果，却见不到它本身。对于普通的民众，瘟疫的发生是不可解释的，不可解释而又强作解释的结果通常就是阴谋论。阴谋跟瘟疫一样都处在事物的背面，无法被事实证伪——那些看似与阴谋相反的事实可以很方便地解释为阴谋者掩盖自身的行为。因此，历史上每一次瘟疫过程都伴随着对阴谋者的甄别和审判：女巫、犹太人、投毒者。基于阴谋论无法被证伪的性质，辟谣对它是无效的。因此，与其徒劳地与某些人的心魔搏斗，还是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对付现实的病魔吧。■